

温故知新

——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

楼宇烈 著



商务印书馆

温 故 知 新

——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

楼宇烈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放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楼宇烈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ISBN 7-100-04161-9

I. 温… II. 楼… III. 哲学-中国-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380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温放知新

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

楼宇烈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161-9/B·606

2004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1/2

印数 4 000 册

定价:32.00 元

前 言

在学生们的关怀、督促、帮助下,选录了我近 20 多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国哲学和文化方面的部分文章,编集成这本论文集,取名《温故知新》。

我虽然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也讲过不少有关的专题,但坦白说,我在写作中,却从来没有过一个系统的或整体的计划。因此,至今我没有写过一部专著,甚至也没有写出过一部定型的专题性讲义。这本论文集中的 30 多篇文章,就是这样一种没有系统和整体计划文章的简单汇集。

取名为《温故知新》的用意,是希望读者读了这些旧文中的陈词陋见后,能创发出众多富有启迪的新知卓见来。而对自己来讲,回头看看自己过去写的一些文章,反省一下自己的学术、思想历程,也希望能从中悟出一些新的思考方向和道理来。

在课堂上,我从不要求学生把我所讲的都记下来,考试时更不要求学生把我所讲的东西当作标准答案来死记硬背。我只希望学生们听我的课能得其意而忘其言,如能领会个中意,则简单记上几笔,以备将来回忆时起个提示作用,也就可以了。同样,读我的文章,我也希望大家能得其意而忘其言,并由此旧意而推出您的新意鸿文,这是我衷心的期盼。

为了尊重历史,收入论文集集中的文章一律按原来发表的面貌。其中有些观点已有变化,细心的读者,在前后不同的文章中当会有所发现,这里就不一一声明了。

楼宇烈

2004年5月

目 录

前言	1
郭象哲学思想剖析	1
试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哲学思想	29
“莫若以明”释——读《齐物论》杂记一则	67
开展对中国文化总体上的综合研究	75
汤显祖哲学思想初探	79
易卦爻象原始	101
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125
黄宗羲心性说述评	141
论传统文化	154
熊十力“量论”杂谈(三则)	167
儒家“节欲”观的现代意义	179
“用中”和“时中”——儒家实践的辩证原则	189
胡适的朱熹研究	196
中国传统哲学中主体修养学说的认识论意义	210
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	232
胡适的中古思想史研究述评	238
康有为与儒学的现代转化	255

理学大师马一浮·····	270
袁宏与东晋玄学·····	282
老庄的顺自然与反异化思想·····	319
儒家修养论今说·····	325
读帛书《系辞》杂记·····	347
中国儒学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	356
荀子礼乐论发微·····	382
儒家思想与官僚文化·····	401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	429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452
对于 21 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	490
明代儒家哲学与栗谷思想·····	511
东方文化的历史反思与展望·····	524
中国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549
发扬人文精神,建设人间哲学——	
21 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	579
欧阳建《言尽意论》正读·····	590
儒学在现代韩国·····	600
中国现代社会与儒家伦理·····	623
发扬人文精神,重视自我修养——	
纪念孔子诞辰 2550 周年·····	640

郭象哲学思想剖析*

郭象字子玄,生于公元 252 年(魏嘉平四年),死于公元 312 年(晋永嘉六年),是西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之一。

郭象的主要著作《庄子注》,相传是在向秀注的基础上“述而广之”而成的。此外,他还有《论语体略》(或称《论语隐》)一书,已佚失,只有部分内容保留在皇侃的《论语义疏》中。对于郭象的哲学思想,历来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他与裴颢的“崇有”论一致,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有的则认为,他的哲学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本文想谈谈个人对郭象哲学思想的一些看法,以求正于大家。

一、“独化”说的神秘主义本质

“独化”一词是郭象创造出来用以解释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一个基本哲学概念。所以,“独化”说是郭象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郭象“独化”说的提出,是有其先前理论斗争上的背景的。

在郭象之前,玄学唯心主义者,如何晏、王弼等都提倡“贵无”,

* 原载于《中国哲学》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8月版。

以“无”为天地万有的“本”、“体”。如何晏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之为事，由无以成”（《道论》，见《列子·天瑞篇》注）。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老子》四十章注）。又说：“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亨之毒之，为其母也”（《老子》一章注）。“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老子》十一章注），等等。这些都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统摄于“无”这个根本，离开“无”就没有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变化。这种“贵无”的唯心主义理论在社会上传播，造成了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许多流弊。西晋时裴頠就指出，那种崇尚虚无的风气，使人们“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晋书·裴頠传》）。因此，他专著《崇有论》以释“贵无”之蔽。他指出，“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认为，从理论上讲，“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同上）。经过裴頠的批判，暴露了“贵无”论在理论上的荒谬和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流弊。

郭象的“独化”说从表面上看是接过了裴頠关于“无”不能生“有”，“始生者，自生也”等观点的。因此，他也反对何晏、王弼等“贵无”论者把“无”说成是统摄万有生成、变化的共同“本”、“体”的理论。但是，他把“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绝对化、神秘化，使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成为一个不可捉摸、神秘莫测的领域，因而他的“独化”说在理论上又与裴頠的“崇有”论有着根本的不同。

郭象对于“无”的看法，与裴頠也是不同的。裴頠对“无”的看法是：“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晋书·裴頠传》）。他认为，“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同上）。这就是说，在裴頠看来，所谓

“无”，是“有”的亏损或消失。郭象是如何来解释“无”的呢？他说：“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在宥注》）。又说：“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知北游注》）。这是说，“无”不是相对于“有”而言的，“无”既不是生成万物的“本”、“体”，也不是“有”的亏损或消失。“无”仅仅是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没有任何原因或根据，而是“自生”的。所以，郭象概括他对于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庄子注》序）。这也是他“独化”说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这方面来讲，郭象的“独化”说具有反对宗教神学“造物主”的意义。他曾明确地说：“万物万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终不得。则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齐物论注》）。因此，他十分强调天地万物生成和变化的“自然而然”。他说：“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同上）。“自然即物之自尔耳”（《知北游注》）。又说：“（天）不运而自行也，（地）不处而自止也，（日月）不争所而自代谢也。皆自尔”（《天运注》）。这些观点，应当说是郭象“独化”说中包含的合理因素。但是，郭象的“独化”说中还有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的内容。那就是，他认为天地万物的这种自然而然的生成、变化，都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而突然发生的。这也就是他常说的，“突然而自得”（《天地注》），“欻然自尔”（《庚桑楚注》），“忽然而自尔”（《知北游注》），“掘然自得”（《大宗师注》）等等。就这方面来讲，郭象的“独化”说具有严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郭象所谓“突然而自得”、“忽然自尔”等,也是为了强调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没有任何原因和根据的。他认为,不仅“无”不能生“有”,而且“有”也不能生“有”。如他在解释《庄子》“必出乎无有”一语时说:“此所以明有之不能为有,而自有耳”(《庚桑楚注》)。对于这种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不需要任何条件的思想,郭象有一简明的概括,即所谓:“独生而无所资借”(《知北游注》),或者说:“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齐物论注》)。在这个问题上,郭象有一个十分错误的逻辑推理。他认为,如果事事物物都要寻求其原因或根据,这样寻求起来就没有个边际了,因此,只有断然肯定一切事物都是“无待”、“无所资借”的,才能使“独化”的道理明白透彻。这就是他说的:“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率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齐物论注》)。列宁曾经说过:“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57页)。郭象的“独化”说正是从反对宗教神学的“造物主”、反对天地万物依赖于“造物主”而生成、变化这一点上往前多走了一步,从而得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不需要任何条件,没有任何原因或根据的错误结论。

唯物主义认为,就整个宇宙来说,它的存在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也就是说,物质世界存在的根据就在它自身之中,不应当到它之外去寻找什么根据。但是,就物质世界中的每一具体事物来讲,则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不需要依赖其他事物,没有任何原因、条件而独自存在的个体。郭象所谓的“独生而无所资借”,并不是指整个宇宙存在而言的。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个一个样的独立个体,只有个性,而不存在共性。

即使如他说的“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逍遥游注》），也只不过是万物个体数量上的总和，而非指万物整体共性而言的。因此，他讲的“独生而无所资借”，完全是指每一个体事物的生存、变化不需要任何条件和任何原因的。郭象的这种思想就和裴颢“崇有”论中的观点有了根本的不同。裴颢否定“无”能生“有”，但却强调“有”必须有所“须（待）”、有所“资”，即必须有所依赖、有其根据才能生存。这就是他说的：“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当然，裴颢说的这种依赖或根据是：“济有者皆有也”，即万物互相依赖、互为条件，或者说互为因果，而并不是到万物之外去找什么原因或根据。所以，裴颢的思想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郭象则不然，他把所谓“物各自生”推向绝对化，根本否定万物的个体生存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根据，根本否定事物之间的依赖关系和因果关系。在这一点上，郭象是走得非常远的。他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不仅不需要外部的条件，甚至也没有内部的原因。他说：“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大宗师注》）。可见，郭象所谓的“有”，只是一个个独自突然发生和变化着的孤立个体，无根无源，互不关联。不仅如此，这样的“有”，就连它自身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冒了出来。这样的世界，只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所以说，郭象的“独化”说，在论证天地万物生成和变化的问题上，虽然抛弃了“造物主”，却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泥坑。

郭象的“独化”说为什么会从否定“造物主”而陷入天地万物毫无原因的突然自生的神秘主义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他的那个错误逻辑推理外，还有其理论上的根源。郭象虽然反对王弼“以无为本”的理论，即反对把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归结为由一个共同的

根源“无”所决定。但他在论证每一事物个体的生成、变化是“无待”、“无故”的时候,不仅把“无”绝对化,使每个个体都成为没有任何原因、条件的孤立存在,而且进一步把“无”抽象化,把“无”归结为每个个体的“真性”。郭象认为,每个事物都有它的“迹”和它的“所以迹”。“迹”是指事物的“形”、“象”,“所以迹”是指事物的“真性”。从事物的这两方面来说,郭象认为事物的“迹”是其“所以迹”的表现。他在注《庄子》“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一语时说:“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则六经也”(《天运注》)。意思是说,“六经”只是先王之“迹”,这种“迹”是先王的“真性”,即“所以迹”的表现。具体来说,如“黄帝非为仁义也,直与物冥,则仁义之迹自见”。“尧虽在宥天下,其迹则治也”(《在宥注》)等等。郭象又认为,“迹”是表现出来的东西,有形有象,可言可说,也就是已生之“有”。这种已生之“有”是要受到时间、空间的局限的,所以是“不足恃”的。如他说:“诗礼者,先王之陈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为奸,则迹不足恃也”(《外物注》)。又说:“法圣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应变之具也,奚足尚而执之哉”(《胠篋注》)?!既然“迹不足恃”,则当求之于“所以迹”。郭象认为,“所以迹者,无迹也”(《应帝王注》)。这是说,“所以迹”是无形无象、不可言说的,因而也是无法认识的。他说:“浑沌玄同,孰识之哉?所识者,常识其迹耳”(《天地注》)。然而,这个“无迹”的“所以迹”却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局限,可以“乘群变,履万世”(《应帝王注》)。

郭象在解释“无迹”时曾说过:“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无迹”(《缮性注》)。从这里看,郭象所谓的“无迹”,仍有任物自然,反

对“造物主”的意义。但他也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把“无迹”抽象概括为万物的“真性”、“所以迹”。不仅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要弃其形、象(即“迹”),而存其“真性”。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捐迹反一”(《在宥注》),或者叫“返一以息迹”(《缮性注》)。他说:“莫知返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谬矣”(同上)。他把事物的形迹看成是保存事物“真性”的极大累害,说什么:“寻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秋水注》)。所以,“苟不能忘形,则随形所遇而陷于忧乐,左右无宜也”(《外物注》)。“有形者,自然相与为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徐无鬼注》)。这里,我们可以回过去考察郭象的“独化”说在否定“造物主”的同时,又认为“有之不能为有”的观点的理论根源了。那就是,他认为“形”、“迹”是“不足恃”的,只有无“形”无“迹”,才是事物的“真性”,才是万物“独化”的根据。他在解释《庄子》“虽然有族有祖,可以为众父,而不可以为众父父”一句时说:“众父父者,所以迹也”(《天地注》)。

至此,郭象所谓的“无迹”或“无”,已远远超出了他最初所解释的“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齐物论注》)的范围了。他已经把“无”通过绝对化、抽象化的加工,凝固为决定万物之“迹”的“所以迹”了。他十分强调“迹”和“所以迹”的本质不同。如说:“圣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圣人,犹云及至其迹”(《马蹄注》)。又说:“夫尧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在宥注》)。于是,他得出结论,只有超出“迹”的范围,进入“无迹”的领域,才能真正寻得事物的“真性”。他说:“物之所有,其实至虚。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后至焉”(《则阳注》)。“唯无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于

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秋水注》)。抛开具体的事物形象去找什么“所以迹”,这样的“所以迹”只能是空洞、抽象的“无”。把空洞、抽象的“无”作为具体、实在的“有”的生存根据,“真性”所在,这只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这样,郭象在实际上也就走上与王弼等“以无为本”的相同的道路上了。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王弼把“无”作为体现于天地万物之中的一个统一的、独一的“本”,而郭象则是把“无”作为天地万物每个个体各自的“真性”(亦即“本”)。换言之,王弼认为,天地万物只有一个统一的“本”,一“本”统摄“万有”;郭象认为,天地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本”,而是一物有一物之“本”。然而,他们所说的“本”都是“无”则是相同的。所以,郭象“独化”说的最后归宿乃是,每个个体事物在其“所以迹”,亦即“无”的“真性”的规定下,自满自足地生成着、变化着。这也就是郭象“独化”说陷入神秘主义泥坑的唯心主义理论根源。

二、“依乎天理”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郭象“独化”说的神秘主义是以其唯心主义理论为基础的,那么郭象的唯心主义理论究竟属于哪一种性质的唯心主义呢?过去有些研究者根据郭象反复强调的“物各自足其性”的观点,断定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其实不然。这里想先从分析郭象哲学理论中对于偶然和必然的一些观点着手,这是搞清楚郭象唯心主义体系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郭象的“独化”说强调事物的“突然而自得”、“欬然自尔”、“掘

然自得”等等,从这一方面看,他似乎是说每一事物的生成、变化完全是偶然的。这也是他反对万物有一个统一的根本,反对“造物主”的观点所必需的理论说明。然而,如果依此推论下去,其逻辑上的必然结论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是杂乱无章的。这是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也是与郭象所要论证的封建门阀士族统治秩序合理性的愿望相违背的。因此,郭象在说明事物生成、变化是“掘然自得”的同时,又着重强调“性”、“命”对事物生成、变化的决定意义,而这种“性”、“命”对于每一事物来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力量。如他说:“性之所能,不得不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为”(《外物注》)。又说:“夫物皆先有其命,故来事可知也。是以,凡所为者,不得不为;凡所不为者,不可得为。而愚者以为之在己,不亦妄乎”(《则阳注》)。总之,“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不仅如此,郭象还认为,事物的这种“性”、“命”是非主观所能移易的、禀受于外部而起作用于内部的一种决定力量。如说:“命非己制,故无所用其心也”,“天然在内,而天然之所顺者在外”(《秋水注》)。由此可见,郭象所谓的“自足其性”并不是指事物个体主观上的自满自足,而是指在事物生成之前就给他规定好了一种“性”、“命”,每一事物只能在被规定好了的“性”、“命”之中自满自足。因此,绝不能仅据“自足其性”一语而判定郭象的哲学思想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体系。

以下再从郭象对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方面来看他对偶然和必然的一些论述。郭象在论述事物之间的关系时,曾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同时发生或先后出现,只是事物各自“独化”的巧合,没有任何互相依赖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他说的:“今罔两之因景,犹

云俱生而非待也，则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齐物论注》）。“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大宗师注》）。所以，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上，他也是强调偶然的。但是，这也只是郭象论证事物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的说法。而与此同时，当他论证事物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合，整个天地万物之间为什么如此和谐时，他又只能强调必然了。如他在解释“唇亡齿寒”时，一方面认为“竭唇非以寒齿”，即“竭唇”与“齿寒”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竭唇”的结果会引起“齿寒”，所以又不得不说，这种“自然相生”，乃是一种“必至之势”（《肱篋注》）。又如，他在解释整个世界的和谐时，一方面认为天地万物“皆历然莫不独见”，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天地万物的这种“独见”，无非都是“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婴儿之直往也”（《人间世注》）。即是说，天地万物的“独见”并不是个体自由意志的表现，而只是依照“天理”的规定，发挥自身所禀受的“性命”去“独见”罢了。因此，他认为，在天理性命必然力量的规定下，“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大宗师注》）。

把郭象以上论述归纳起来，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分析事物的现存状况，如具体事物的生成、变化、关系等时，郭象是强调偶然的。而在分析事物为什么这样生成、变化，为什么是这种关系等时，郭象是强调必然的。用郭象的哲学术语来讲，就是当他分析事物的“迹”时，是强调偶然的，而当他分析事物的“所以迹”时，则强调必然了。在分析“迹”时，郭象强调事物的“自得”、“自有”、“自生”，而当分析“所以迹”时，郭象则把所有的“自得”、“自有”、“自